

◎名家近况

对话张莉——

发现文学中的女性之美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张莉近照 郭红松绘

问：您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重回历史现场，考察冰心、凌淑华、冯沅君、陈衡哲、庐隐等第一批中国现代女作家如何出现，还原她们走出闺阁、接受国民教育、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过程。您是如何关注到这个话题的？这批女作家的出现，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史意义？

答：我认为，女性文学史不只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它还是现代女作家出现的历史。在这本书中，我所做的是站在中国立场思考中国女性问题，寻找女性文学发生的背景，而不是依靠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寻找到真正属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身传统。

今天我们把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其实它并不必然产生现代意义的女性写作。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晚清把妇女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对抗“贤妻良母”之战，另一场是“五四”运动——它为妇女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的目标。如果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写作者。这些作者是对社会主动发表看法、表达爱情意志、向传统发出挑战、与男青年并列行走的女青年。

在这种回顾中，我看到冰心她们当时写作的艰难，更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给女性文学发展带来的契机。她们之所以成就自己，与社会变革、觉醒者们的努力、课堂上导师们的指导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女性写作，应该回到那个宏阔的社会历史场域里去。

问：2018年，一百多位作家收到了一份您的调查问卷，其中涉及对女性写作的理解、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观等问题。不论男作家、女作家，都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的回答为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提供了有现场感和说服力的数据和样本，请您谈谈这项调研。

答：性别观调查目的在于普及男女平等这一常识。我希望更多人认识到作家的性别观很重要，它构成了当代文学里的性别想象，也会对未来的读者构成深远影响。我的体会是，这是一项充满在场感的调查研究，在场

她——是评论家，倡导“在场性”批评，密切关注新人新作；是学者，深情回眸一百多年前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女作家的知音，通过编年选、设榜单推动创作；她，还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主讲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课一座难求……她——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其女性文学研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路标。在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围绕文学中的女性之美这一话题，本报记者对张莉进行了专访。

性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极为重要，它要求研究者走出书斋，与当下创作和社会现实发生互动，而不是关起门来，把自己埋进书堆里。

问：您为北师大学生开设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课深受欢迎，能否谈谈课程设置的初衷？您希望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

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也是北师大的前身。大部分第一代现代女作家，比如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等，都是女高师学生。在这里，李大钊先生为她们讲授过女权主义理论，传播妇女解放思想，鲁迅先生也在女高师教书，还曾在女高师附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可以想象，正是因为这些觉醒者的辛勤培养，才有了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的迅速崛起。“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课，主要希望同学们了解女性文学发展史，了解学校的优良传统，培养年轻学子阅读经典、进行创造性写作的能力。

问：刚才提到“在场性”这个主张，可以看出您对今天的女性写作保持着密切关注。您曾主编《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一书，收录翟永明、林白、叶弥等13位女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您认为，“新女性写作”的“新”体现在哪里？

答：“新女性写作”的“新”，是相对于以往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和“中产阶级趣味”而言的。它强调的是女作家要走出狭隘视野，号召写作者要重新直面我们的时代生活。你看，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巨变；文学内外，中国女性的精神气质和身体形象也都有显著的变化。关于何为女性文学之美和女性写作之美的判断标准也悄然改变。这是我为什么将新女性写作专辑命名为“美发生着变化”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好的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好的作品应该让人心生热爱而非心存仇恨，它应该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应该是开阔、辽远、包容的，而非对抗、排斥和封闭的。当代女性文学史上，出现了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迟子建等重要作家，她们的许多作品是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

问：从2019年开始，您主持编选《中国女性文学选》，迄今为止已出版3册。能否谈谈作品的遴选标准及其意义？

答：这是我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中国女性文学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

女性故事，力求通过鲜活生动的文学表达，真实展现当代女性生活，传递出杂花生树的当代女性之声。我希望多年过去，我们还能从中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女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

具体到入选标准，首先要深具文学性，要真切反映我们时代的女性生活，还要涵盖不同年龄段女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尤其是每年有意入选5到6位新面孔，以此鼓励青年女作家写作。现在在各高校的创意写作专业都培养了不少优秀青年作家，其中涌现出的“90后”新一代女写作者大多有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名校，已成为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

问：除了《中国女性文学选》，您还和“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工作室”创办了一个“好书榜”，分春、夏、秋、冬四季和年终总榜，为读者推荐了不少文笔优美、卓有见地的女性文学作品。据悉，这个榜单每期的推荐人基本是青年学生。它的具体产生过程是怎样的？青年的声音在我们的文学评价机制中有哪些独特的作用？

答：这个榜单主要关注和推荐文学现场涌现出来的女作者及其新作。设立的初衷有二，一是发掘新的女性写作者；二是鼓励青年一代批评家介入现场，参与我们的文学批评。北师大有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设立这一排行榜其实也是带研究生们一起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在书目挑选上，他们会认真搜集近期出版的女作家作品，在仔细阅读的基础上，开会讨论哪部作品可以推荐并撰写推荐语。我尊重年轻人趣味，对他们的推荐语要求是诚实、不浮夸，“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最新一代读者的声音。我非常高兴通过这个榜单看到作家与青年读者之间、作家与市场 and 出版社之间形成良好互动。

问：除了这些女性写作的专书，您还出版了一本《小说风景》，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构。这些经典已被无数前人阐释过了，但此书仍有很多新颖的观点和视角，比如对《祝福》的解读。女性视角为我们阐释作品、理解文学提供了哪些特别的帮助？

答：我在《小说风景》里试图探寻这些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读法，坦率说，女性视角帮助了我的解读，但它不是女性主义批评，我只是认取了自己的女性批评家身份。

以《祝福》为例，我认为从小说中固然可以看到鲁镇对祥林嫂的种种压迫，但是站在祥林嫂的视角，我们会看到鲁迅也真切书写了祥林嫂的多次反抗。她其实一直在努力争取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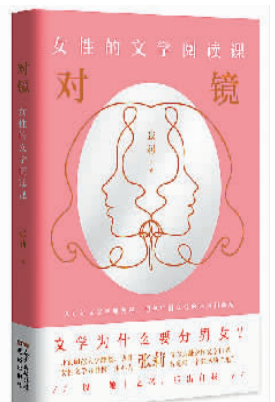
的自主权。比如被卖到山里那次，头撞香案，就是反抗的方式。因为作家正视祥林嫂的女性身份和她的反抗，这个人物才真正鲜活起来，让人久久难忘。用女性视角来阅读，既能看到这些经典之所以是经典的原因，又可能重新激发我们对经典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赵园老师的《论小说十家》就有这样的视角，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问：今天的青年女作家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下创作势头强劲，值得期待的青年女作家有哪些？您对未来女性写作有什么期待？

答：这十年来，中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80后”“90后”女作家，比如笛安、孙频、蔡东、文珍、董夏青青、马小淘、孟小书、修新羽、崔君、王海雪、叶昕昀、三三、王侃瑜等。

我心中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要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生活和生存状况，要真切记录我们这个时代女性精神、女性气质的变迁。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要对个体经验进行书写挖掘，同时也要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生活，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

今天，新时代文学已经启航，我们的女作家有理由、有能力写出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女性文学作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非常期待新的女性文学、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新疆壮美美丽，作为一个新疆人，我愿纵马驰骋于天山南北的每一个角落，但也许不包括柯柯牙。为什么？在我遥远的记忆里，那是一片亘古的荒原、宁静的死水。柯柯牙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是阿克苏市风沙的策源地，那里寸草不生、盐碱板结、风沙肆虐，每年有近100天，人们的生活被沙尘笼罩。现在，柯柯牙变了。得益于柯柯牙绿化工程这一全国荒漠绿化的典范工程，这里成了边疆碧野、瓜果之乡。

毋庸置疑，这是阿克苏人克服天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举。董明侠、钱建军二人集三年之力完成的报告文学《诗意栖居柯柯牙》，则是对这个壮举的忠实记录。

作者笔下，这样一幅画卷徐徐展开：阿克苏人民面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横亘百万余年的荒原戈壁，数代人接力，在茫茫黄沙间构筑起一条逾百万亩的人工林带。我看到一个个身影、一张张脸庞。他们毫不吝惜地在贫瘠的土地上重重砸下沉甸甸的汗珠，前前后后30年，无数柯柯牙人奉献出这珍贵的“一点水”，竟孕育了柯柯牙的“绿色长城”。只此青绿，正当春归，柯柯牙精神由汗水凝聚而生。

1985年，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的顾富平感到，如果不根治风沙，就不能改善阿克苏人民的生活，更无法把这个随时有覆巢之虞的阿克苏城传给子孙后代。于是，地委班子当年就发动全社会力量，包括各族干部群众和驻地官兵，人工治沙、造林绿化。自此，柯柯牙绿化工程正式拉开帷幕，30年里，七任地方领导更迭，绿化工程一直坚持下来，共组织54次大会战，植树造林115.3万亩、累计栽植树木1337万株。

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柯柯牙绿化工程是一个“三无”工程，没有项目、没有资金、没有设备，但为何阿克苏人能有此壮举？

还是从书中找答案。黄风漫卷，黑云压城，阿克苏人民的生存其实一直在危机中。在这样的生态下，人的精神状态是麻木的。面对千百年来酷烈无情的荒漠，人们已经漠然，只能无言承受。然而，当一个新来的书记带着善念，想要为这里的人们改变点什么的时候，人们最简单朴素的渴望突然就被点燃了。首先是取得领导班子的集体认可，其次迅速获得广大军民群众的支持响应，这才有了阿克苏沙海上浩浩荡荡几十年的精耕细作。反过来讲，恶劣的环境使人变得粗糙厚钝，所以治理环境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在恢复人心中隐藏在麻木背后的那点灵动和敏锐。

我非常理解本书的结构框架，生存、发展、生态是具有递进关系的。我们有生存权，也有发展权；有经济权，也有环境权；有“利权”，也有“美权”。其实，当我们对环境不满足，当我们要将己从生活的粗粝和艰苦中解放出来时，我们也是在追求一种纯粹的美。如果没有这点美，正常的道德秩序和心灵律令将遭到严重损害，而且我们文明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

人类发展史，可以被解读为对自然深度介入的历史。阿克苏人介入自然，是要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但植树造林本身，不是侵入型介入，而是融合式介入，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寻求新的融合。可以说，是阿克苏人成就了今天的阿克苏，糖心苹果、红枣、核桃，无一不是自然的馈赠；是大风大雨和连畦的流水、成排的树荫，见证了今天的柯柯

基本善和自洽美

——《诗意栖居柯柯牙》读后

邱华栋



牙精神。

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是“诗意栖居”四个字。它意味着，绿化工程不仅是阿克苏人的生态治理任务，更指向一种家园意识——人们审美化地栖居于自然之中。比如，护林员勇敢阻拦偷苗和伐树行为，难道他仅仅出于职业操守吗？可能更因为不忍心看着才扎根的小树就这样失去了成长机会。任何一个人，都会很自然地把美当作环境伦理的一个尺度。生命是美的，而保护生命之美的行为则是善的。这和人们需要从自然中获取庇护的要求一样，都是人性对于基本善的演绎。

《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这反映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在自然中的价值凸显必须是一种超越性的、统摄性的。人和自然关于利用与治理的纠葛，源头问题是忘记了人类与自然的多维关系。孤立的主体在经验中是不存在的，冷漠的自然客体其实也只是现代思维中假设出来的，人只有与自己身处的外部环境建立了合理的关系系统，才能在自然中做到美善合一。在此前提下，经济利益只是生态治理的副产品，它永远不是治理的核心目标和唯一价值。

我们要的是“乐”，乐山乐水的怡然之乐。书中勾勒了阿克苏农家的历史，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象征，农家乐建立在经济果林中，利用自然做着服务人心灵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农家乐还创造了就业，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家的温暖。这一文学呈现，把审美体验和生命感悟一并纳入生态治理所关注的视野中。如此，自然就变得有情而多情起来。自然的美是自治的，不需要文字来赋予。因此，柯柯牙精神就不仅是奋斗精神，还有奉献精神，这背后不仅仅有对基本善的追求，还有对自洽美的坚守。

（作者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新作评介

捕捉当代农民的精神成长

杨毅

刻变化。小说中，塔镇最早消失的村庄佟家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创业大潮中成立翰童集团，佟家庄发展为城镇，香庄的上千亩土地进入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香庄村民也经历着集体的身份转变，他们将迁入光善社区，迈向新的生活。

从边远农村到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从原有农耕式的乡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生活，香庄村民既要适应新的城镇环境带来的种种变化，又表现出与故土无法割舍的联系。从前大河湾香庄的村民中，有的成了丰茂生态农场的员工，有的则继续寻找谋生的手段，但就像万镇长说的：“不让任何一个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愿望的新村村民没有劳动的机会。”

从动员村民迁入新社区，到带领人们缔造新城，再到开启新生活，香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墨喜成为光善社区

联合办公点代理书记，以真心实意和不畏劳苦的干劲身先士卒，开创新局面。作者把这基层乡村干部的形象塑造得真实可感，没有夸张地写他神通广大的本领，而是着力刻画他的满腔热忱和决心毅力。李墨喜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而更像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普通人，有着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鲜明特质。小说对主人公李墨喜的刻画，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新人形象。

《大地之上》书写乡村振兴的同时，在写法上将乡村风土人情的自然呈现与带有诗意的叙事风格结合起来。这使得小说着力展现的宏大主题不仅具有大量真实细节的支撑，也带给人超越经验层面的精神升华。书中在叙事中穿插奇幻的神话传说，比如女娲补天之石化作大河湾香庄的“神石”；“引子”处使用的“看官”带有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意味；运用大量诙谐幽默的民谣俚语，如颠倒语、莲花落等，将民间市井风俗生动展现出来。但这些都是作家的写作目的，王方晨着重探讨的是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作家说：“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是我写作的着落。虽然小说充满了大量的民俗风情的描写，但事实上，我的小说世界是开放的。讲地域文化，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倒退。”他认为，新农村人的文化品格，承载着民族文化中最有生机、最优秀、最不屈也是最核心的那部分，而“最核心的那部分”，可以从“蜜蜂”意象中解读出来。《大地之上》说大河湾是个天然的养蜂场，而蜜蜂这个意象的反复出现，则喻示着这里的村民如同蜜蜂般勤劳勇敢而又孜孜不倦，既养育自身又为新农村建设作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大地之上》还是王方晨的一部创新之作。不同于作家此前的城市题材小说，《大地之上》对新农村带有更多的温情，呈现出明朗的色调，为我们展开一幅大地之上奔腾澎湃的生命图景。

忠实记录“漳州110”的使命担当

本报（记者张鹏禹）报警电话110，在今天已是人尽皆知，但在3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1990年，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属大队（“漳州110”）引领全国建立110报警服务平台和快速反应机制，实现了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功能的有效整合，推动“110”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

2021年1月10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宣部向全社会发布“漳州110”先进事迹，授予其“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近期出版的何葆国长篇报告

文学《赤子初心》正是对“漳州110”30多年来奋斗历程的忠实记录。

作者写道：“110，这3个最简单数字的组合，演绎着警察与百姓之间最紧密的故事。这个耳熟能详的报警电话，早已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平安符，而‘110’警察则是‘人民的保护神’。不论是小孩或老人摔伤、歹徒挟持人质，还是群众被骗入传销组织，作者从无比烦琐、错综复杂的险情与警情中梳理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写出了人民警察在危急时刻的应对策略和守护人民美好生活的使命担当。”



王方晨的《大地之上》是一部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它以全国丰茂生态农业组织入驻大河湾香庄为背景，叙写村民们在乡村干部李墨喜带领下，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地上建造新城并开启新生活的故事。《大地之上》以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丰富的细节，生动描绘了基层乡村的真实生态，敏锐捕捉当代农民的精神成长，揭示出当代农村的沧桑巨变。

作为小说的核心情节，现代农业组织入驻大河湾香庄，折射了祖国大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所发生的深